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五期／民國 99 年 9 月／頁 1～36

邁向權力核心之路：
一九八七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

寇健文*

摘　要

近年來，中共高層新老交替已經朝著制度化的方向發展。根據這個觀點，本文歸納十三大以來各屆領導班子甄補特性的演變。本文首先歸納分析一九八七年以後 57 位文職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含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政治流動上的特徵，如年齡限制、政治局委員資歷、中委會資歷、年齡優勢、省級黨政一把手資歷、交流經驗等等。爲了了解這些因素在中共領導人甄補過程中的影響，本文將這些因素歸類爲晉升領導人的基本條件或加分條件，以十七大爲例行測試，最後，本文據此推估二〇一二年可能擔任政治局委員的人選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選。

關鍵詞：中共、政治流動、政治菁英、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

*政大政治系教授、東亞所合聘教授，E-mail: cwkou@nccu.edu.tw。
感謝兩位審查人對本文初稿的指正與修改建議，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99 年 4 月 20 日；通過日期：99 年 7 月 2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早期外界大都從非正式關係的角度探討中共政治繼承的議題，並曾在派系的用法與內涵、派系產生的原因、派系鬥爭的結果三方面出現精采的辯論。[1] 儘管「扈從關係」——派系的基礎——很難直接觀察到，許多學者分析同鄉、同事、校友、家族等等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絡，探討這些關係網絡對菁英流動與決策的影響。[2] 不過，近來更多文獻轉而強調制度因素在領導人流動過程中的影響力，包括年齡限制、任期限制、階梯式晉升規律、省級地方歷練等等。[3] 大體而言，這些文獻認爲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制度因素對中共領導人新老交替的重要性越來越大。非制度因素固然仍具有影響力，但只能在制度因素的框架下產生作用。

早期研究共黨國家的學者曾經指出，政治繼承是共黨國家共通的體制缺陷。[4] 當中共高層的政治甄補出現固定模式和發展趨勢，實際上反映出統治菁英內部對權力分配的遊戲規則已形成共識，致使政治繼承出現「有限的預測性」。這不代表菁英共識不會破裂，也不代表政權能免於社會挑戰，但有助於外界了解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基於上述理由，本文有意呈現近二十年來中共領導人甄補特性的演變，同時以所得結果評估二〇一二年的人事異動。我們希望指出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王岐山、薄熙來等人以外的可能接班人選，並且讓分析過程能符合「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ity）的要求。[5]

1　相關文獻整理見寇健文（2005：18-27）。

2　關於同事部屬關係（秘書幫、團派），請詳見 Li and Lucian (1992: 913-936)；寇健文（2007：49-95）。關於同校關係（清華幫），請詳見 Li (1994: 1-30)。關於家族關係（太子黨），見 Tanner (1993: 89-119)；Bo (2006: 195-232)。直到最近，還有學者認爲同事關係足以影響各省取得國有銀行貸款的多寡（Shih, 2004: 3-19）。

3　關於年齡限制、任期限制、階梯式晉升規律的分析，請詳見寇健文（2005：190-197）。關於省級領導人歷練的重要性，見 Bo (2003: 66-117)。關於中共走向制度化的討論，見寇健文（2006：39-75）。

4　關於早期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相關討論與各共黨國家政治繼承的實例分析，請詳見寇健文（2005：46-54）。

5　「相互主觀」意指若多數人同意某件事物存在，我們就把這件事物視爲客觀存在。見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歸納十三大以來各屆領導班子甄補特性的演變，進而討論演變趨勢對政權穩定的意涵。本文首先歸納分析一九八七年以後 57 位文職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含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文皆同）在政治流動上的特徵，如年齡限制、政治局委員資歷、中委會資歷、年齡優勢、省級黨政一把手資歷、交流經驗等等，並將這些因素歸類爲晉升領導人的基本條件或加分條件。其次，以十七大的實際甄補結果測試篩選標準的正確性，再推估二〇一二年可能擔任政治局委員的人選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因軍職和文職領導人晉升路徑與模式不同，軍職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共 8 人）排除在本文討論範圍。[6] 本文使用的幹部簡歷資料均來自人民網、新華網、官方出版的人名錄、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等公開資料，時間至二〇一〇年六月爲止。

本文受到幾個研究限制的影響。首先，由於缺少或無法有系統地蒐集、分析相關資訊，政績表現、健康情形、關係網絡等已知重要因素並未納入分析。健康情況對幹部生涯發展影響甚鉅，但相關資料一般不公開。幹部在政績表現、關係網絡兩方面的優勢，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反映在早期的晉升速度與任職種類。[7] 但這兩個因素在正部級幹部晉升爲領導人過程中是否發揮「臨門一腳」的影響，卻因缺少可靠的資料、無法準確測量而放棄。

其次，某些未知的重要因素可能沒有納入分析。舉例來說，中共規劃領導班子配置時究竟考慮哪些因素？性別？族裔？專長？還有沒有其他因素？到目前爲止仍不夠清楚。此外，在十八大前，中共仍可能拔擢副部級中委會成員出任正部級黨政職務，但本文無法現在就把他們列入分析對象。最後，中共領導人交替的制度仍在演進中，新規範的出現會導致本文基於歸納法得出的結論出現誤差，如過去曾經發生領導人的退休年齡從 70

美華等（1998：65）。

6 這 8 位將領是十四屆的劉華清和楊白冰，十五屆的遲浩田和張萬年，十六屆的曹剛川和郭伯雄，十七屆的郭伯雄和徐才厚。除劉華清爲政治局常委外，其餘均爲政治局委員。

7 在制度化的影響下，幹部缺少適當歷練便無法晉升領導人。若要刻意提拔某些幹部進入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必須先安排他們擔任重要的省部級黨政職務，並縮短晉升所需時間。因此，仕途發展路徑已經包含這兩個因素的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歲降至 68 歲。這些缺點是本文在方法上的無法克服的限制。雖不一定造成評估結果出現結構性偏差，但一定會增加誤差的範圍。爲了了解這些限制對本文預估的影響，本文在提出十八大可能出現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之前，先根據本文提出的基本條件和加分條件篩選十七大領導班子的組成人選，以便和實際選出的名單對照。

本文分成五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描述中共高層決策體制的演變歷程。第二個部分根據過去二十年的甄補模式，分別討論晉升政治局委員需要的中委會資歷、正部級職務歷練、年齡要求三個特徵。第三個部分則把焦點放在地方經歷與交流經驗兩方面。第四部分根據前兩節的分析，歸納出評估十八屆政治局委員的三個基本條件和七個加分條件。同時以十七大爲例進行測試，再預估十八大連任或新任政治局委員的可能人選。第五個部分歸納晉升政治局常委的甄補特徵，包括政治局委員歷練、年齡要求、地方經驗與交流經驗。接著，第六個部分根據這些特徵，同樣先以十七大爲例進行測試，再評估十八屆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人選。

貳、中共高層決策體制的演變：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

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是中共的最高決策中心，實施「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相結合的制度」。一九七六年九月以前，高層決策體制從集體領導的雛型逐步走向毛澤東個人領導，毛澤東死後決策體制從個人領導逐漸轉回集體領導模式。一九八〇年代的集體領導是以鄧小平爲主，陳雲、李先念、葉劍英等革命元老爲輔的寡頭協商模式，正式職務並不影響他們的決策權力，因此此時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不一定是最高決策中心。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革命元老先後死亡，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才成爲真正的決策中心，集體領導也逐漸制度化。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領導體制已經開始走向個人領導。[8] 建政以

[8] 延安整風（1942 年 2 月至 1945 年 4 月七大召開）之後，決策權向毛澤東個人集中。19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毛澤東權力更加集中。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毛澤東可以不出席政治局會議，但政治局的決定必須有毛澤東的同意，方能落實（席宣、金春明，1996：35-36）。[9] 毛澤東死後，無人能承續他的個人權威。黨內高層出現數次路線上、權力上的嚴重衝突，如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鄧小平和陳雲之間等，但集體協商在高層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隨著暴力程度降低而增加。一九七七年十一屆政治局常委會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組成。隨著凡是派大權旁落，陳雲被增選爲政治局常委，決策協商主要集中在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四人之間，而鄧小平逐漸獲得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多數支持（薛慶超，2006：168-171），成爲高層決策者之首。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前，鄧小平的最高領導人身分，以及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人協商決策的領導方式仍然相當穩定（趙建民、劉松福，2007：62）。[10] 他們還可透過文件圈閱批示或電話指示影響中央書記處決策（吳國光，1997：22-23；阮銘，1993：38-39；李銳，2001）。同時，革命元老年事已高，對於改革開放的速度與幅度見解也不同，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決策多由元老透過非正式會議決定，政治局不常開會（李銳，2001：36-37；吳國光，1997：306；Barnett, 1985: 10-11）。由於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不如三位革命元老，此時的集體領導是建立在領導人個人權威之上，與其擔任的職務無關，人治色彩較高。

一九八七年鄧小平等元老退出政治局，由趙紫陽、李鵬、喬石、姚依林、胡啓立等人組成常委會。中共修改黨章並制定黨內法規，釐清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三個機構的功能。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政治局通過《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工作規則（試行）》、《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工作規則（試行）》、《十三屆中央書記處工作規則（試行）》，使集體領導開始走向制度化（陳瑞生等，1992：37）。根據相關文獻，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的職權都可分爲「政策決定權」和「人事決定權」兩類，兩機構在職權方面的主要差異在於前者著重於「日常、緊急的重大政

年 5 月共產國際解散，制約毛澤東權力的唯一機構消失，毛澤東權力在 1944 年 5 月六屆七中全會上定於一尊。見陳麗鳳（2008：120-124）；劉松福（2008）。

[9] 相關例證見胡偉（1998：225-226、228-229）。

[10] 1985 年葉劍英因身體狀況退出第一線領導崗位，致使協商機制中的人數減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策」，後者則偏向決定「非日常、非緊急的重大政策」，致使前者開會頻率遠高於後者（趙建民、劉松福，2007：69）。[11] 當時鄧小平等元老仍在幕後掌權，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都不是最高決策中心，但這些法規奠定日後集體領導制度的基礎。

十三大同時將中央書記處的決策功能取消，確立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決策地位。在一九八〇年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恢復中央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制度。中央書記處的有四種功能：一、負責爲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討論、決定問題作事先準備；二、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事項；三、負責組織起草用中央名義發布的一般性黨務工作文件；四、辦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交代的其他事項（中共中央組織部，2006：40）。由此可見，此時的中央書記處具有決策權。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改爲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構」，內部運作則調整爲「首長（總書記）負責，分工辦事」（趙建民、劉松福，2007：65）。由此可見，中央書記處已被定位爲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幕僚單位。[12]

政治局常委屬於「國家級正職」，地位均高於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政治局常委會人數並無硬性規定，近二十年來的慣例約爲五人至九人。（表 1）擔任常委前須經相當歷練，特別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國務委員等黨政資歷。政治局名義上的地位高於政治局常委會，但開會頻率遠低於政治局常委會，實際權力也比較小。一九九二

[11] 關於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的職權和運作規範，見寇健文（2006：48-49）。

[12] 根據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這種作法有助於加強中央領導機構的聯繫，提高書記處的工作效率和權威，使重大黨政事務能夠得到及時處理。同時，中央書記處承擔著大量日常性事務，在指導和監督各項工作，制定執行具體政策，加強黨的建設等方面，發揮領導職能（李林，2007；李海文，2009）。在內部運作上，書記處書記按照職責分工，分管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交辦的各項工作。中央書記處處理黨的日常工作，如登錄、收發、管理領導人的批示與領導人之間的公文往返，記錄所有黨內高層會議內容，分類並上呈下級黨政部門的公文給分管的領導人審閱，並根據批示確定後面的工作。一切文件、決定不是經書記處下發，都不算是作爲黨的文件和決定，下級黨組織可不執行，領導人若越過書記處而向下級發令，只能認定爲個人行爲（作者不詳，無刊登時間）。因此，中央書記處恢復設立之後，該機構常務書記幾乎都是由政治局常委擔任，也是總書記接班人熟悉全國事務的關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一九八二年以後中共領導班子成員異動情形

屆　別	職　務	姓　名	備　註
十三大 1987/11	常務委員	趙紫陽（免職）、李鵬、喬石、胡啓立（免職）、姚依林、江澤民（增選）、宋平（增選）、李瑞環（增選）	1.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屆四中全會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爲常委，免去趙紫陽、胡啓立常委、委員職務。
	委　員	萬里、田紀雲、江澤民、李鐵映、李瑞環、李錫銘、楊汝岱、楊尚昆、吳學謙、宋平、胡耀邦、秦基偉【軍職】	
	候補委員	丁關根	
十四大 1992/10	常務委員	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軍職】、胡錦濤	1. 一九九三年二月譚紹文病逝。 2.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屆四中全會增選黃菊爲委員。 3.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四屆五中全會開除陳希同的黨籍，撤銷黨內外職務
	委　員	丁關根、田紀雲、李嵐清、李鐵映、楊白冰【軍職】、吳邦國、鄒家華、陳希同（免職）、姜春雲、錢其琛、尉健行、謝非、譚紹文（病逝）、黃菊（增補）	
	候補委員	溫家寶、王漢斌	
十五大 1997/9	常務委員	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	1. 一九九九年十月謝非病逝。
	委　員	丁關根、田紀雲、李長春、李鐵映、吳邦國、吳官正、遲浩田【軍職】、張萬年【軍職】、羅幹、姜春雲、賈慶林、錢其琛、黃菊、溫家寶、謝非（病逝）	
	候補委員	曾慶紅、吳儀（女）	
十六大 2002/11	常務委員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病逝）、吳官正、李長春、羅幹	1. 二〇〇七年六月黃菊病逝。 2. 二〇〇七年七月政治局開除陳良宇黨籍、撤銷公職。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六屆七中全會確認。
	委　員	王樂泉、王兆國、回良玉（回族）、劉淇、劉雲山、吳儀（女）、張立昌、張德江、陳良宇（免職）、周永康、俞正聲、賀國強、郭伯雄【軍職】、曹剛川【軍職】、曾培炎	
	候補委員	王剛	
十七大 2007/10	常務委員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	
	委　員	王剛、王樂泉、王兆國、王岐山、回良玉（回族）、劉淇、劉雲山、劉延東（女）、李源潮、汪洋、張高麗、張德江、俞正聲、徐才厚【軍職】、郭伯雄【軍職】、薄熙來	
	候補委員	無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十四大之後，政治局全體人數介於 22 人至 25 人之間，相對穩定。部分政治局委員同時擔任正部級職務，但其職權高於一般正部級幹部，所需資歷也比較深。政治局候補委員列席政治局會議，無投票權，排名也列在政治局委員之後，但兩者級別均屬於「國家級副職」。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革命元老干預的現象逐漸消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與中央書記處，始能按照黨章及黨內法規開始運作。同時，江澤民和胡錦濤因權力基礎遠不及鄧小平深厚，必須更仰賴制度性協商，僅能以「同儕中的第一人」（first among equals）自居。中共高層人事同時越來越穩定，除了陳希同（一九九五年）和陳良宇（二〇〇六年）兩位政治局委員之外，無人在屆中被罷黜。接下來，本文歸納過去二十年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含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集體特徵。

參、晉升政治局委員的特徵㈠：中委會資歷、正部級職務、年齡要求

自一九八〇年代中共推動幹部年輕化政策以後，年齡就成爲幹部退休或晉升的一項決定性因素。其次，年齡因素必定反映在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的群體特徵上。同時，隨著權力鬥爭的激烈程度降低，中共高層政局逐漸穩定，幹部晉升隨之出現「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階梯式晉升規律。擔任政治局委員前，先擔任過中委或候委，以及正部級職務；擔任政治局常委前，先擔任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候補委員（寇健文，2005：212-220）。由此觀之，中委會資歷、正部级職務也是中共領導人的群體特徵之一。最後，中國大陸幅員遼闊，領導人必須面對複雜的情勢，做出正確判斷。據此，在不同省份或部委擔任領導幹部可說是磨練接班人選，擴大他們視野的最佳方式。在接下來的兩節中，本文分別從中委會資歷、正部級職務、年齡要求、地方經歷、交流經驗等不同面向，分析十三大至十七大之間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甄補特徵。

一、中委會資歷（中委或候委）

中委會由國家機器各系統的領導人組成，中委會資歷就成爲政治菁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上流動的基本資歷。[13] 在一九八七年以後迄今的 51 位新任政治局成員中，只有譚紹文、曾慶紅兩人未先具備中委會資歷就進入政治局，比例爲 3.9%，其餘 49 人（96.1%）均已擔任過中委或候委數年。[14] 譚紹文是六四事件後的第二波人事安排，並非計畫內的調動。[15] 如今擔任政治局委員的地方一把手都是由具有中委會資歷的幹部調任，不會出現這種現象。[16] 此外，曾慶紅的例子也不易再現。中央辦公廳負責主要領導人的秘書、後勤等工作，包括醫療、保安、通信、檔案等日常事務。該職務往往由最高領導人的親信擔任，而且經常擔任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根據一九七八年以後的經驗，中央辦公廳主任就職數年後，會在下一次黨大會進入政治局，如溫家寶、曾慶紅、王剛。任職期間未遇到黨大會，或任職數個月就適逢黨大會，便暫時不進入政治局。前者如姚依林、喬石、王兆國，後者如胡啓立、令計劃。[17]

同時，在期中增補政治局成員的情形下，才可能挑選本次黨大會首度當選中委的幹部升任。此外，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先擔任中委（通常爲五年以上）後才進入政治局，只擔任一屆候委就成爲政治局成員的人很

---

[13] 根據慣例，中委、候委的主要來源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各部委部長（主任）；解放軍各總部、各兵種、各大軍區、軍事院校軍事和政工正副首長；省委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副省級市或重要地級市黨委書記；重要人民團體與大型國有企業主要負責人。

[14] 本文提到「新任」時，均排除在十三大連任的十二屆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他們是趙紫陽、萬里、田紀雲、楊尚昆、胡耀邦、吳學謙等 6 人。若十二屆政治局委員在十三大當選政治局常委，如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因有職級晉升，被納入分析範圍。

[15] 譚紹文在 1987 年爲天津市委副書記，無緣進入十三屆中委會，並在 1988 年 5 月任天津市政協主席，是天津爲數不多的正部級幹部。六四事件之後，原天津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瑞環升任政治局常委。1989 年 9 月譚紹文出任天津市委書記，直到 1992 年十四大方有機會進入中委會。因此出現第一次進入中委會的時候，就出任政治局委員的例外情形。

[16] 近年中共已經措施讓重要職務由具有中委會成員身分的幹部擔任。如十六大的時候黃華華以廣東省委副書記、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當選中委，2003 年 1 月他就當選省長。再如江蘇省委書記回良玉當選十六屆政治局委員，2003 年 3 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十六屆候委李源潮則由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職務調升省委書記。

[17] 曾慶紅 1989 年隨江澤民進京，出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93 年 3 月晉升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在十四大的時候只是副部級幹部，沒有進入中委會。十五大時，他以中央辦公廳主任身分當選中委，並出任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少。這些例外包括朱鎔基、李嵐清、吳邦國、陳良宇、王剛、李源潮、汪洋等 7 人，占 51 位新任政治局委員之中的有中委會資歷 55 人當中的 13.7%。

最後，極少數中委已經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委員。這兩個職務是國家級副職領導人，與政治局委員級別相同，又是重要的黨政職務。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以後，除非仕途中斷（如芮杏文和嚴明復），或出身紀檢和政法系統（如任建新、何勇），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領導人若在下一次黨大會召開時仍未超齡（63 歲），就會出任政治局委員（如溫家寶）。國務委員亦同，如羅幹（當時爲 58 歲）在一九九三年當選國務委員，一九九七年當選政治局委員。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歸納出下列特徵：一、中委會資歷是晉升政治局委員的重要資歷。首度當選政治局委員的領導人當中，接近全數都先擔任過中委或候委數年，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出現例外。二、中委晉升爲政治局委員的可能性遠高於候委。首度當選政治局委員時，絕大多數領導人已經具有數年中委資歷，但僅有候委資歷的幹部仍有些許機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因此，中委資歷對晉升政治局委員應該具有加分效果，但既非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三、非紀檢和政法系統中，年紀較輕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委員都會進入下一屆政治局。雖然前例不多，但可視爲晉升政治局委員的一項充分條件。

二、正部級職務歷練

接下來，本文從正部級職務歷練分析晉升政治局委員的路徑。十三大到十七大之間，所有 51 位新任政治局成員均先擔任正部級職務，才進入政治局，顯示階梯式晉升規律的強度。二〇〇七年六月中共召開黨員領導幹部會議，就可新提名爲十七屆政治局組成人員預備人選進行民主推薦。會中胡錦濤指出，列入預備人選的年齡條件是 63 周歲以下正部長級幹部和軍隊正大軍區職幹部，並要充實一些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年輕同志，以形成合理的梯次結構（劉思揚等，2007）。由此可見，正部级職務歷練已經是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必要條件。同時，除譚紹文一人是在天津市政協主席職務上取得正部級級別之外，其他 50 人都是在黨務或政府系統工作時成爲正部級幹部，比例高達 98.0%。這顯示級別雖然相同但職務重要性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也會影響幹部進入政治局的機會。

此外，擔任正部級職務不足五年以下就晉升政治局委員（以下簡稱爲「快速晉升」）的人數呈現下滑的趨勢。十三屆至十五屆首次當選政治局委員的領導人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屬於「快速晉升」，顯示幹部年輕化政策造成第三梯隊幹部快速升遷。（表 2）自十五屆開始，「快速晉升」的比例大幅下滑。主因在於部分領導人相當年輕就出任正部級職務，但非最快晉升政治局委員，正部級歷練無形中被拉長。「快速晉升」的比例驟降到十六屆的 15.4%，再降到十七屆的 12.5%。相對的，擔任正部級職務五年以上的比例從一九九〇年代的六成五左右增加到二〇〇〇年代的 85% 以上。這顯示二〇〇〇年以後正部級幹部晉升政治局委員所需的平均時間，大體要比一九九〇年代要長一點。

表 2　新任政治局委員的正部級歷練時間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四年以下	42.9% (3)	35.7% (5)	33.3% (2)	15.4% (2)	12.5% (1)
五年以上	57.1% (4)	64.3% (9)	66.7% (4)	84.6% (11)	87.5% (7)
總　　數	100.0% (7)	100.0% (14)	100.0% (6)	100.0% (13)	100.0% (8)

*軍系政治局委員未納入分析，十三屆的人數不包含連任的政治局委員。一九八九年晉升爲政治局常委的江澤民、李瑞環、宋平納入十三屆新任政治局委員的人數。越級晉升政治局常委的領導人納入新任政治局委員計算。以下各表皆同。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兩個結論：一、正部級黨政職務是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必要條件。幹部若不具備正部級黨政職務經歷，沒有角逐政治局委員的基本資格。同時，政治局委員的正部級職務歷練幾乎都不是人大政協系統職務。二、相對於歷練時間不到五年的幹部，正部級職務歷練時間在五年以上的幹部更具有進入政治局的競爭優勢。但由於近十年來仍有一成多的正部級幹部「快速晉升」爲政治局委員，五年以上正部級資歷雖是重要的加分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年齡要求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中共推動幹部年輕化之後，年齡就成了幹部任免的關鍵。超齡幹部退出第一線黨政領導崗位，轉往人大政協、群眾團體「發揮餘熱」，或完全退休。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幹部退休的年齡延伸至領導人。十五大建立了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 70 歲劃線離退的先例，在十六大獲得確認，並於十七大確定把退休年齡降到 68 歲（寇健文，2005：151-155、159-162）。

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換屆改選時都有超過 70 歲的領導人連任或新任政治局委員。（表 3）如十三屆的姚依林（70 歲）、萬里（71 歲）、楊尚昆（80 歲）、宋平（70 歲）、胡耀邦（72 歲），另有趙紫陽一人年滿 68 歲。一九八九年增補三名政治局常委中，宋平是超過 70 歲的新人。十四屆政治局成員之中，年齡最大的是喬石（68 歲）。十五屆政治局成員中，江澤民（71 歲）一人超過 70 歲，年齡介於 68～69 歲的成員共有李鵬（69 歲）、朱鎔基（69 歲）、錢其琛（69 歲）、田紀雲（68 歲）、丁關根（68 歲）5 人。十六屆、十七屆所有政治局成員的年齡都在 68 歲以下，無一例外，顯示 68 歲劃線退休的原則已經定型。

表 3　政治局全體成員的當選年齡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新任	70 歲以上	29.4% (5)	0.0% (0)	4.5% (1)	0.0% (0)	0.0% (0)
	68～69 歲	5.9% (1)	4.8% (1)	22.7% (5)	0.0% (0)	0.0% (0)
	67～64 歲	5.9% (1)	28.6% (6)	18.2% (4)	21.7% (5)	39.1% (9)
	63～60 歲	23.5% (4)	38.1% (8)	18.2% (4)	52.2% (12)	34.8% (8)
	59 歲以下	35.3% (6)	28.6% (6)	36.4% (8)	26.1% (6)	26.1% (6)
總數		100.0% (17)	100.0% (21)	100.0% (22)	100.0% (23)	100.0% (23)

*本表數據包括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但扣掉各屆軍職政治局委員。實際上，軍職政治局委員的年齡多半偏高。如十三屆的秦基偉（73 歲），十四屆的劉華清（76 歲）、楊白冰（72 歲），十五屆的張萬年（69 歲）、遲浩田（68 歲）。十六屆以後軍職或文職政治局委員無人超過 68 歲。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齡因素不只是領導人退休的決定因素，也成爲晉升領導人的重要關鍵。近來晉升政治局委員的最高年齡也逐漸形成，以 63 歲劃線，超齡者無緣晉升，連任者不在此限。（表 4）從十五大起，新任政治局成員的當選年齡就很少超過 63 歲，僅一人例外（十六屆的曾培炎）。[18] 十七屆新任政治局委員的當選年齡須在 63 歲以下，更是中共刻意降低政治局新人年齡的結果（劉思揚等，2007）。此外，自十五大之後，各屆政治局新人的年齡結構出現變化，不到 60 歲的新人始終占全體初任者的五成多，與過去模式不同。這顯示比晉升政治局委員的最高年齡—— 63歲——小約 5 歲或更年輕的幹部，要比 60 多歲的幹部具有年齡上的競爭優勢。每逢單數屆則會出現 59 歲以下新人比例非常高的現象，如十五屆的 83.3%和十七屆的 75.5%。二〇〇七年中共就新任政治局委員可能人選進行民主推薦時，也特別強調要「充實一些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年輕同志，以形成合理的梯次結構」（劉思揚等，2007）。這都顯示中共爲落實梯隊接班，大量讓接班人選進入政治局熟悉工作，以便部署下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世代交替。

表 4　新任政治局委員的當選年齡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新任	70 歲以上	14.3% (1)	0.0% (0)	0.0% (0)	0.0% (0)	0.0% (0)
	68～69 歲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67～64 歲	0.0% (0)	28.6% (4)	0.0% (0)	7.7% (1)	0.0% (0)
	63～60 歲	42.9% (3)	42.9% (6)	16.7% (1)	38.5% (5)	25.0% (2)
	59 歲以下	42.9% (3)	28.6% (4)	83.3% (5)	53.8% (7)	75.0% (6)
總數		100.1% (7)	100.1% (14)	100.0% (6)	100.0% (13)	100.0% (8)

*總數一列括弧中的第一個數字是該屆政治局新人總數。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18] 軍方成員一直是各屆政治局中年齡較高的人，但不在本文分析範圍內。十三屆超過 70 歲而首度當選政治局委員的劉華清（常委）、楊白冰兩人皆爲軍方將領。十四屆軍方出身的政治局委員年齡依舊偏高，張萬年（69 歲）、遲浩田（68 歲）的年齡遠高於文職政治局委員。十五屆軍系政治局委員曹剛川（67 歲）是所有政治局委員中年齡最長的人。另一位軍系政治局委員郭伯雄只有 60 歲，與過去相比，已經是很年輕的了。十六屆軍系政治局委員徐才厚（64 歲）還是所有新人中年齡最長的人。十七屆軍方政治局委員均爲連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歸納出下列結論：一、自十六大以後，低於劃線離退年齡（68 歲）已成爲領導人連任的基本條件。因無人例外，甚至可說年齡因素是領導人連任的必要條件。政治局委員以年齡劃線退休的規定已經制度化，政治局常委也受到此一年齡限制的拘束，尚未屆齡的領導人則通常（但非必然）可以連任。總書記應當也受拘束，但尚無實際案例。二、近年來，63 歲年齡劃線已成爲幹部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必要條件。自一九九七年十五大起，政治局委員首度進入政治局的時候，幾乎全部都在 63 歲以下，僅一人例外，十七大時更正式以 63 歲做爲年齡要求。三、比晉升政治局委員的最高年齡——63 歲——小約 5 歲或更年輕的幹部，要比 60 多歲的幹部具有年齡上的競爭優勢。但這種年齡優勢並非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

肆、晉升政治局委員的特徵㈡：地方經歷、交流經驗

一、地方經歷：省級黨政一把手

接下來，本文討論十三大以後各屆政治局委員的省級黨政一把手歷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省級領導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省級領導人需要面對社會經濟實體的整體運作，處理經濟發展、失業問題、政治穩定、社會福利等問題，所以省級行政經驗（省委書記、省長）提供了訓練國家領導人的絕佳機會（Li, 2002: 1-3）。副部級的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固然是省級重要領導人，但其決策權遠低於省委書記和省長，政績表現也不夠明確。因此，本文把政治局委員的地方歷練侷限在正部級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兩項職務上，副部級的地方歷練均未納入分析範圍之內。

自二〇〇二年起，省級黨政一把手歷練的重要性快速提升。根據本文自行統計的數據，若以每屆全體政治局人員爲計算範圍，具有省級一把手歷練的比例，從十三屆的 52.9%、十四屆的 47.6%、十五屆的 50.0%，提高到十六屆的 69.5%，再升高到十七屆的 82.6%。另一個證據則是新任政治局委員缺少地方經歷的人數下降很多。十五大以後，新人中缺少省級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把手歷練的比例最高爲十五屆的 50.0%，逐漸降到十七屆的 12.5%。（表 5）

表 5　新任政治局委員曾擔任省級黨政一把手的比例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有省級一把手歷練	71.4% (5)	57.1% (8)	50.0% (3)	76.9% (10)	87.5% (7)
無省級一把手歷練	28.6% (2)	42.9% (6)	50.0% (3)	23.1% (3)	12.5% (1)
總　　數	100.0% (7)	100.0% (14)	100.0% (6)	100.0% (13)	100.0% (8)

*部分政治局委員同時擔任省級黨委書記，但任職時間都比出任政治局委員要早一年以上。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此外，具有省級一把手經驗的政治局委員都有省委書記資歷，無一例外。若缺少省委書記或中央部委首長的經歷，省長無法直接晉升爲政治局委員。這顯示省委書記和省長雖然都是正部級幹部，但省委書記資歷對進入政治局的競爭優勢遠高於省長資歷。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歸納出下列特徵：一、省級黨政一把手的經歷已經成爲晉升政治局委員的重要競爭優勢。二、省委書記資歷又比省長更重要，可成爲另外一個加分條件。不過，由於沒有地方領導經驗的幹部仍有少量晉升政治局委員的機會，這兩種競爭優勢並非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

二、交流經驗：省際交流、部門交流、中央與地方交流

幹部交流制度主要指領導幹部在上下級機關之間、地區之間、地區與部門之間、黨政之間以及沿海與內地、經濟比較發達與相對落後地區之間進行交流（李民，2007）。政治局的決策攸關全國大局，成員對於全局性問題的判斷與決策經驗非常重要。領導人若在不同單位歷練過，有助擴大視野和強化多元思考的能力。因此，近年來中共極力重視幹部交流的重要性。一九九〇年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實行黨和國家領導幹部交流制度的規定》，開始建立幹部交流的制度，並於一九九四年十四屆四中全會重申幹部交流的重要性。二〇〇六年八月中共頒布《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規定幹部交流可以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地方與部門之間，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群眾團體之間進行。[19]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源潮指出，有計畫地安排年輕幹部到艱困地區、關鍵崗位交流，以培養執政、應對能力。讓年輕幹部在充滿艱難任務、重大事件、重大自然災害等情境下接受考驗。[20] 根據中共制定幹部交流制度的作法，中共刻意培養幹部的專長與歷練，自然有助於增加幹部日後晉升的機會。[21]

根據前述內容，本文把交流經驗區分爲「省際交流」、「部門交流」、「中央地方交流」三種。「省際交流」是指擔任過兩個省份以上的黨政一把手（省委書記或省長），若先後擔任同一個省份的省長和省委書記並不算爲「省際交流」。「部門交流」是指在兩個以上中共中央或國務院所屬機構、全國性群眾團體、大型國有企業擔任正部級職務。「中央地方交流」則指分別在中央機構（包括黨政部門、全國性群眾團體、大型國有企業）和省級黨政領導機構擔任過正部級職務。

從表 6 可以看出，在新任政治局成員中，有交流經驗的比例自十四屆的 28.6% 逐漸增加，到十七屆時已達 75%。這顯示交流經驗的重要性確實增加。不過，交流經驗雖代表幹部的競爭優勢，但並非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其次，若以各類交流比重的變化來看，涉及「省際交流」、「中央地方交流」的各種交流組合的比重多半呈現增加的趨勢，涉及「部門交流」的比重則呈現下降趨勢。改革開放後各省的自主性增加，加上中央會針對沿海、內陸不同地區提出各自的重點發展項目，因此歷練不同省份一把手使得幹部的視野與能力更加完整。最後，擁有兩種交流經驗的幹部並未比一種交流經驗的幹部更具有晉升優勢。自十五屆以後，具有一種交流經驗的比例至少在五成以上，兩種交流經驗的比例至多只有兩成五。

---

19 新華網，2006 年。

20 李玉梅，2009 年。

21 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均爲國家級副職，因已另外討論，不列入計算。部分幹部同時擔任國家級副職和正部級職務，如政治局委員和北京市委書記。這些正部級職務都被納入計算。若國家級正職領導人兼任正部級職務，因該正部級職務已經無助於領導人晉升，均排除在外。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非實權單位，其副手（副委員長和副主席）、秘書長資歷不列入考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6　新任政治局委員的正部級交流經驗

政治局所有成員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無	42.9%(3)	71.4%(10)	50.0%(3)	38.5%(5)	25.0%(2)
省際交流	0.0%(0)	0.0%(0)	33.3%(2)	23.1%(3)	25.0%(2)
部門交流	14.3%(1)	21.4%(3)	16.7%(1)	7.7%(1)	0.0%(0)
中央地方交流	28.6%(2)	0.0%(0)	0.0%(0)	23.1%(3)	25.0%(2)
省際交流與部門交流	0.0%(0)	0.0%(0)	0.0%(0)	0.0%(0)	0.0%(0)
省際交流與中央地方交流	0.0%(0)	7.1%(1)	0.0%(0)	0.0%(0)	25.0%(2)
部門交流與中央地方交流	14.3%(1)	0.0%(0)	0.0%(0)	7.7%(1)	0.0%(0)
合　　計	100.1%(7)	99.9%(14)	100.0%(6)	100.1%(13)	100.0%(8)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歸納出下列特徵：一、省級地方經驗是晉升政治局委員的有利條件，呼應前述省級一把手是晉升領導人加分條件的觀點。二、交流經驗雖有助於幹部晉升爲政治局委員，但兩種以上交流經驗並未比一種交流經驗更有競爭優勢。這表示適當交流經驗有助於日後晉升，但過多交流經驗不利於晉升。此因中共厲行幹部年齡限制，過多交流經驗通常代表幹部在正部級職務任職過長，將使其喪失年齡上的競爭優勢。

伍、測試十七屆政治局委員與預估十八屆政治局委員可能人選

根據前面兩節歸納出的甄補特徵與趨勢，配合當前的局勢，本文整理出一些指標，用來評估二〇一二年十八屆政治局委員的可能人選。這些指標分爲兩類，第一類爲三項「基本條件」。幹部必須符合這些條件，方能取得當選政治局委員的基本資格，不合乎這些條件的幹部則喪失機會，亦即必要條件。另一類指標爲「加分條件」。幹部符合加分條件的數量越多，競爭優勢越強。然而，除領導人資歷（擔任國務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充分條件以外，其餘加分條件既非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缺少部分加分條件的幹部並非沒有毫無機會進入政治局。

一、基本條件

1. 基本條件一（中委會資歷）：十八屆政治局委員將從十七屆中委和候委中挑選。因違法亂紀或負起政治責任，辭去中委職務或其他黨政職務的幹部喪失晉升政治局委員的機會。
2. 基本條件二（正部級黨政職務歷練）：十八大召開時，新任政治局委員將從正部級黨政幹部（包含擔任副部級職務但享受正部級待遇的幹部）中挑選。擔任副部級黨政職務、正部級人大政協職務的幹部無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可能性。

   說明：一九九二年以後僅十四屆的譚紹文一人例外，但他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的第二波人事異動，屬於特殊情況。當前中共政局尚稱穩定，應無破例的需要，故擔任正部級人大政協職務的幹部無晉升政治局委員的機會。
3. 基本條件三（年齡限制）：十八大召開時，超過 68 歲（一九四四年以前出生）的十七屆政治局委員喪失連任資格，未超過 68 歲者可以連任。對於目前不是政治局成員的中委會成員來說，64 歲（一九四八年以前出生）以上就喪失晉升政治局委員的機會。63 歲以下（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則符合新任政治局委員的年齡要求。

   說明：一九九七年以後僅十六屆的曾培炎一人例外，首度當選政治局委員時已經超過 64 歲。二〇〇七年中共明訂以 63 歲做爲新任政治局委員推薦人選的審查標準，故可將不超過 63 歲視爲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必要條件。

二、加分條件

1. 加分條件一（副國級黨務或政府經歷）：只要未超齡，已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或國務委員職務，但非政治局成員的中委，必會進入政治局。

   說明：此加分條件爲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充分條件。其餘加分條件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表競爭優勢，但均非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

2. 加分條件二（中委資歷）：十七屆中委比十七屆候委更有機會晉升爲十八屆政治局委員。
3. 加分條件三（年齡優勢）：58 歲以下的中委會成員（一九五四年以後出生）比 63～59 歲（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出生）的成員更有可能晉升政治局委員。
4. 加分條件四（正部級年資）：十八大召開時，已在正部級職務歷練五年以上的中委會成員，比歷練時間在四年以下的成員，更有機會進入政治局。
5. 加分條件五（省級一把手歷練）：十八大召開時，已擔任過省級黨政一把手的中委會成員，比沒有這項歷練的成員，更可能進入政治局。
6. 加分條件六（省委書記歷練）：擔任過省委書記的幹部比只擔任過省長的幹部更有機會晉升政治局委員。
7. 加分條件七（交流經驗）：十八大召開時，已有交流經驗的中委會成員比缺少交流經驗的成員更有機會晉升政治局委員。

在評估十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可能人選之前，本文先以十六屆中委會爲對象，依照本文建立的篩選標準，推估十七大人事佈局的「預測名單」，並核對與「實際當選名單」的差別。（表 7）測試結果發現，除劉延東「出人意料」當選政治局委員之外，其餘十七屆連任或新任政治局委員均在「預測名單」之上。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滿足「領導人資歷」之外的全部（六項）加分條件，是典型的政治局委員熱門人選。由此可見，本文前面得出的篩選標準應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僅管誤差範圍還不能進一步縮小。

本文接著根據三個基本條件，篩選十七屆 204 位中委和 167 位候委。在二〇一二年十八大召開時，習近平、李克強兩位政治局常委可望順利連任，李源潮、王岐山、俞正聲、張高麗、薄熙來、汪洋、張德江、劉雲山、劉延東等 9 人則是低於 68 歲的政治局委員。按照過去經驗，他們可能連任政治局委員。其餘 7 位政治局常委和 7 位政治局委員都將屆齡退休。

在非政治局委員的中委會成員中，扣掉軍系成員 64 人、司法系統成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人，因案被捕或免職的 4 人之後，[22] 擔任過正部級黨政職務，而且在二〇一二年十八大召開時年齡在 63 歲以下的中委共有 57 人，候委有 21 人。（到二〇一〇年六月爲止）換言之，只有這 78 人角逐十八屆政治局委員的機會。

表 7　以十七屆政治局委員為例的評估測試

姓　名	測　試　結　果	實際情況	說　　明
周永康	可能連任政治局委員或晉升政治局常委	晉升政治局常　委	1. 在二〇〇七年十七大召開之際，均爲 63 歲以下的十六屆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超過 68 歲者（吳儀、曾培炎、張立昌）、健康不佳者（張立昌）或受黨紀司法處分者（陳良宇）均未連任。 2. 劉雲山在二〇〇二年首度當選政治局委員時，沒有省級黨政一把手資歷，亦無任何交流經驗。按照本文的篩選標準，他在十六大時並非政治局委員的熱門人選，與十七大劉延東的情況類似。
賀國強			
俞正聲			
張德江			
劉　淇			
劉雲山	可能連任政治局委員	連任政治局委　員	
回良玉			
王　剛			
習近平	新任政治局委員熱門人選	新任政治局常　委	1. 滿足「領導人資歷」之外的全部（六項）加分條件者共 4 人。
李克強			
李源潮		新任政治局委　員	1. 滿足「領導人資歷」之外的五項加分條件者共 21 人。 2. 滿足「領導人資歷」之外的其他四項加分條件者共有 7 人，無人晉升政治委員。
張高麗			
王岐山			
薄熙來			
汪　洋			
劉延東	非政治局委員熱門人選	新任政治局委　員	1. 滿足「領導人資歷」之外的其他三項加分條件以下爲非熱門人選。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接下來，本文利用七個加分條件評估這 78 位十七屆中委會成員的競爭優勢。由於「副國級黨務或政府經歷」一項加分條件是充分條件，滿足此條件者預期必定成爲 18 屆政治局委員。滿足越多其他加分條件的人，競爭優勢越強，但不必然進入政治局。（表 8）首先，王滬寧和令計劃兩

[22] 于幼軍被剝奪中委資格，由王新憲遞補，孟學農（中委）、康日新（中委）、吳顯國（候委）曾因犯錯而被免職，四人毫無機會晉升政治局委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8　十八屆政治局委員可能人選的競爭優勢評比

			領導人資歷	中委資歷	年齡優勢	正部級年資	省級一把手資歷	省委書記歷練	交流經驗
可能連任		習近平	略						
		李克強	略						
		李源潮	略						
		王岐山	略						
		俞正聲	略						
		張高麗	略						
		薄熙來	略						
		汪　洋	略						
		張德江	略						
		劉雲山	略						
		劉延東	略						
可能新任	滿足領導人資歷條件	王滬寧	○	○	○	○	X	X	X
		令計劃	○	○	○	○	X	X	X
	滿足其他六項加分條件	楊傳堂	X	○	○	○	○	○	○
		趙樂際	X	○	○	○	○	○	○
		胡春華	X	○	○	○	○	○	○
		孫政才	X	○	○	○	○	○	○
		周　強	X	○	○	○	○	○	○
	滿足其他五項加分條件	王　珉	X	○	X	○	○	○	○
		孫春蘭	X	○	X	○	○	○	○
		吉炳軒	X	○	X	○	○	○	○
		盧展工	X	○	X	○	○	○	○
		劉奇葆	X	○	X	○	○	○	○
		張春賢	X	○	X	○	○	○	○
		韓長賦	X	○	○	○	○	X	○
		宋秀岩	X	○	○	○	○	X	○
		張寶順	X	○	X	○	○	○	○
		袁純青	X	○	X	○	○	○	○
	滿足其他四項加分條件	郭庚茂	X	○	X	○	○	X	○
		張慶黎	X	○	X	○	○	○	X
		王　君	X	○	X	○	○	X	○
		姜異康	X	○	X	○	○	○	X
		強　衛	X	○	X	○	○	○	X
		楊　晶	X	○	X	○	○	X	○
		韓　正	X	○	○	○	○	X	X
		王正偉	X	○	○	○	○	X	X
		張慶偉	X	○	○	○	X	X	○
		郭聲琨	X	X	○	○	○	○	X
		徐守盛	X	○	X	○	○	○	X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均爲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屬於國家級副職領導人，與政治局委員的級別相同，並分別擔任中央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辦公廳主任兩個職務。由於他們在二〇一二年十八大的時候都未滿63歲，按過去經驗，應可進入政治局。此外，共有 5 人滿足其他六項加分條件，10 人滿足五項加分條件，11 人滿足四項加分條件。這 28 人將成爲十八屆政治局新任委員的主要來源。

當然，他們並不會全部都晉升政治局委員，端視本文未納入的因素而定。舉例來說，楊傳堂是中共長期培養的邊區大員，但二〇〇五年底因腦溢血一度辭去官職，返回北京養病，未必能夠晉升政治局委員。又如中共若認爲十八大是第五代領導人全面接班的時機，並無歷練第六代領導人的急迫性，條件傑出的孫政才、胡春華、周強等一九六〇年代出生的幹部就不需要立即進入政治局。

只滿足三項加分條件或更少加分條件的人共有 50 位，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可能性相對較低。他們大多是省長和國務院部委首長中正部級職務經歷較爲單一、資淺的菁英，包含十七位省長和二十餘位國務院部委首長，如剛當選青海省省長的駱惠寧和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正部級）的楊煥寧。

陸、政治局常委的甄補特徵：政治局委員資歷、年齡要求、地方經驗、交流經驗

一、政治局委員資歷

討論完十八屆政治局可能人選之後，本文接著分析政治局常委的甄補特徵。自十三大起，政治局委員資歷已是晉升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條件。（見表 9）先具有政治局委員資歷數年，之後才晉升常委者約占全體新任政治局常委的 83.3%。一九八七年以後至二〇〇七年，未先單獨歷練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候補委員），直接擔任政治局常委的領導人分別是十四大的朱鎔基、胡錦濤，以及十七大的習近平、李克強，占 16.7%。由於這些人都是例外情況，因此必須分析出現的原因。

一九九二年十四大的時候，鄧小平爲了安排身後佈局，基於培養總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總書記接班人的緣故，提拔朱鎔基、胡錦濤兩人。[23] 朱鎔基原爲上海市市長，被鄧小平安排爲總理接班人選。他在一九九一年上調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級副職），稀釋李鵬在國務院的保守力量。胡錦濤是鄧小平爲了確保改革派繼續掌控總書記大位，而採取的「隔代指定」，讓他從正部級的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越級晉升爲政治局常委。二〇〇七年十七大的時候，習近平、李克強兩人跳過政治局委員台階，首次當選政治局常委。當時中共曾舉行黨政領導幹部會議，就新任政治局委員預備人選進行民主推薦。會中胡錦濤特別提出要甄補一九五〇年代的優秀幹部，讓領導班子形成合理的年齡結構。由此可見，甄補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也是爲了培養總書記和總理接班人選。[24]

表 9　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局委員資歷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無政治局委員歷練	0.0% (0)	100.0% (2)	0.0% (0)	0.0% (0)	50.0% (2)
有政治局委員歷練	100.0% (7)	0.0% (0)	100.0% (2)	100.0% (8)	50.0% (2)
合　　計	100.0% (7)	100.0% (2)	100.0% (2)	100.0% (8)	100.0% (4)

*十四屆政治局常委劉華清因係軍人，不納入分析。下同。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同時，中共在一九八〇年代經常期中調整中央領導班子，增補成員。自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屆四中全會增選黃菊爲委員後，不再增補政治局委

[23] 另外，鄧小平還提拔劉華清擔任政治局常委。劉華清在就任常委前也未曾擔任過政治局委員，但因屬軍人，並未納入分析。劉華清的軍中資格甚老，原已準備退休，鄧小平爲了幫助江澤民鞏固軍權，特別重用他。他退休之後，軍方將領無人擔任過政治局常委，可見他的特殊性。劉華清和朱鎔基均非前一屆政治局委員，但都已擔任過「國家領導人副職」。前者原爲軍委副秘書長，等同軍委委員級別，1989 年以後還擔任軍委副主席。

[24] 這兩個職務的接班人選可以「越級晉升」，其他常委人選卻不能越級是解決「年齡限制」與「進階規律」彼此矛盾的方法。中共以年齡限制保持第一線幹部相對年輕，但「進階規律」又要求幹部必須在重要職級擔任領導職務，每一個「台階」都消耗數年時間，致使領導人不一定年輕。因此，當中共要培養總書記和總理接班人選時，就可能出現「越級晉升」的現象，以便讓接班人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練習領導人的角色，擔任領導人後還能任職 10 年左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已有 16 年，足見中共維持領導班子穩定的趨勢。政治局常委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也不再出現期中增補的現象。

根據上述討論，本文歸納出兩個結論：一、自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以後，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歷以成爲晉升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資歷，只有在培養總書記和總理接班人選時才可能出現例外。二、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期中增選政治局委員的情形已不再出現，故新任政治局常委幾乎都是從前一屆政治局委員中產生。

二、年齡要求

依照前面關於新任政治局委員年齡要求的討論，換屆改選時，政治局委員的年齡必須低於 68 歲，此爲連任或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必要條件。政治局常委也是政治局委員，因此適用前述年齡限制，如十六大時李瑞環（一九三四年九月生）退出政治局常委會，十七大時羅幹（一九三五年七月生）、吳官正（一九三八年八月生）、曾慶紅（一九三九年七月生）退出常委會。不過，新任政治局委員年齡應在 63 歲以下的規定並未適用在新任政治局常委身上。十七大的周永康（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生）、賀國強（一九四三年十生）當選常委時都已經年滿 64 歲。

此外，十八大正逢十年一次的中央領導班子世代交替，新選出的常委多數要能任職兩屆十年，以維持領導班子的穩定性。[25] 舉例來說，一九九二年十四大選出選出的七位政治局常委中，有擔任總書記和總理等職務的 5 人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上連任，連任比例高達七成一。二〇〇二年十六大選出的政治局九位常委中，包括總書記和總理在內的五人在二〇〇七年十七大連任，連任比例也有 56%。因此，在年齡上，能夠擔任兩屆十年常委的菁英將具有競爭優勢，構成一項加分條件。但因過去部分領導人只擔任一屆政治局常委，如姚依林（十三屆）、尉建行、李嵐清（十五屆）、曾慶紅、吳官正、黃菊（十六屆）等人，十七屆選出的周永康、賀國強基於年齡因素，應該也只能擔任一屆，合乎擔任兩屆十年的年齡並非晉升政治局常委的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

[25] 領導人在位期間約在 10 年左右。見寇健文（2002：67）；寇健文等（2006：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上述討論，本文歸納出三個結論：一、超過 68 歲的政治局常委將退休，不再尋求連任。二、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年齡得高於 63 歲，不受到新任政治局委員 63 歲以下的約束。三、在年齡上能夠擔任兩屆十年政治局常委的菁英，比不具備此條件的菁英更具有競爭優勢，但此競爭優勢並非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

三、地方歷練：省委書記

從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七之間，新任政治局常委曾任省級黨政一把手的比例都維持在 50% 以上，而且在十四屆和十七屆達到 100%。（表 10）與相較，新任政治局常委具有地方一把手歷練的比例約與新任政治局委員相同。雖然有少數常委未擔任過省委書記或省長，但比例相當有限。十三屆 7 位新任常委中，4 位具有地方經驗，李鵬、喬石、姚依林則沒有。十五屆兩位政治局常委中，一位有地方歷練，另一位（李嵐清）則無地方領導經驗。十六屆 8 位初任政治局常委中，溫家寶、曾慶紅、羅幹無地方一把手的經歷，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人數最多的一屆。不過，十七屆四位新任政治局常委全部都有地方經歷。此外，除胡啓立（十三屆）一人之外，所有具有地方一把手經驗的政治局常委全數擔任過省委書記，足見省委書記在仕途晉升過程中的重要性確實高於省長。基於上述分析，本文歸納出一個結論：省委書記是新任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資歷，有助於提高其競爭優勢，但並非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

表 10　新任政治局常委曾擔省級黨政一把手的比例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有省級一把手歷練	57.1%(4)	100.0%(2)	50.0%(1)	62.5%(5)	100.0%(4)
無省級一把手歷練	42.9%(3)	0.0%(0)	50.0%(1)	37.5%(3)	0.0%(0)
總　　數	100.0%(7)	100.0%(2)	100.0%(2)	100.0%(8)	100.0%(4)

*十四屆的劉華清爲軍人，未納入計算。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交流經驗：省際交流、部門交流、中央與地方交流

從表 11 可以得知，一九八七年以後各屆新任政治局常委絕大多數都有交流經驗，比例高達 91.3%。以各屆來看，除十六屆曾經出現 75.0% 以外，其餘各屆均爲 100.0%。這個比例遠高於政治局委員的交流經驗（最高只有 75%）。由此可見，政治局常委管理的事務較政治局委員更廣泛，交流經驗對晉升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性隨之提高，高過晉升政治局委員的重要性。十六屆兩位沒有交流經驗的新任政治局常委分別是吳邦國和黃菊，均爲上海市委書記出身、上海幫成員。此外，各屆新任政治局常委擁有兩種交流經驗的比例和擁有一種交流經驗的比例並不穩定，因此擁有兩種交流經驗並不構成競爭優勢。此與分析政治局委員交流經驗的結論相同。基於上述分析，本文歸納出兩點特徵：一、省委書記是新任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資歷，但不算是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二、交流經驗類別的多寡對於晉升政治局常委沒有影響。

表 11　新任政治局常委正部級職務的交流經驗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無	14.3% (1)	0.0% (0)	0.0% (0)	25.0% (2)	0.0% (0)
省際交流	0.0% (0)	0.0% (0)	0.0% (0)	37.5% (3)	25.0% (1)
部門交流	42.9% (3)	0.0% (0)	50.0% (1)	37.5% (3)	0.0% (0)
中央地方交流	28.6% (2)	0.0% (0)	0.0% (0)	0.0% (0)	0.0% (0)
省際交流＋部門交流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省際交流＋中央地方交流	0.0% (0)	50.0% (1)	0.0% (0)	0.0% (0)	50.0% (2)
部門交流＋中央地方交流	14.3% (1)	50.0% (1)	50.0% (1)	0.0% (0)	25.0% (1)
總　　數	100.0% (7)	100.1% (2)	100.0% (2)	100.0% (8)	100.0% (4)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柒、測試十七屆政治局常委與預估十八屆政治局常委可能人選

根據過去政治局常委晉升的集體特徵，配合現狀，本文綜合整理出一些基本條件和加分條件，用來評估二〇一二年十八屆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人選。

一、基本條件

1. 基本條件一（政治局委員資歷）：十八屆政治局常委將從十七屆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中挑選。
   說明：由於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已爲接班人選，只要他們的健康情形良好，又未犯大錯，他們在十八大應會連任政治局常委。同時，在沒有「培養接班人」因素的干擾下，政治局委員的「台階」因素將是決定性因素。
2. 基本條件二（年齡限制）：十八大召開時，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應會繼續連任政治局常委。年滿 68 歲（一九四四年以前出生）的十七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無法連任或晉升政治局常委。67 歲以下（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的政治局委員則仍保有晉升的機會。

二、加分條件

1. 加分條件一（年齡優勢）：十八大召開時，年齡在 62 歲（一九五〇年以後出生）以下的十七屆政治局委員晉升常委的機會比 67 歲至 63 歲之間（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出生）政治局委員來得高。
2. 加分條件二（地方歷練）：十八大召開時，具有省級黨政一把手歷練的十七屆政治局委員比沒有此經歷的委員更有晉升政治局常委的機會。此處所說的一把手經驗特指擔任省委書記。
3. 加分條件三（交流經驗）：十八大召開時，具有正部級職務交流經驗的十七屆政治局委員比沒有交流經驗的委員，更具有晉升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進行預估十八大可能當選的政治局常委之前，本文依舊以十七大人事佈局爲例進行測試。表 12 顯示，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是基於培養總書記和總理接班人選的需要，越級晉升，未先單獨歷練政治局委員以外，其餘連任或新任的政治局常委都在「預測名單」當中。換言之，本文建立的篩選標準確實有相當的準確性，但誤差還有努力縮小的空間。

測試完之後，本文根據兩個基本條件，篩選十七屆 25 位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二〇一二年十八大召開時，習近平、李克強兩位現任政治局常委將續任，李源潮、王岐山、俞正聲、張高麗、薄熙來、汪洋、張德江、劉雲山、劉延東等 9 人則是低於 68 歲的政治局委員。按照過去經驗，他們之中的多數或全體都可以連任政治局委員。其餘 7 位政治局常委和 7 位政治局委員都將屆齡退休。

表 12　以十七屆政治局常委為例的評估測試

姓　名	評估測試	實際結果	說　　明
賈慶林	可能連任政治局常委	連任政治局常委	● 超過 68 歲者（羅幹、吳官正、曾慶紅、黃菊）、健康不佳者（黃菊）均未連任。
吳邦國			
溫家寶			
胡錦濤			
李長春			
周永康	新任政治局常委熱門人選	新任政治局常委	● 滿足三項加分條件者爲俞正聲。未晉升常委。 ● 滿足兩項加分條件者共 4 人。未晉升常委的兩人爲張德江和劉淇。 ● 未超過 68 歲、健康不佳或受黨紀司法處分的政治局委員均連任。
賀國強			
習近平	非政治局常委熱門人選	晉升政治局常委	● 基於培養總書記和總理接班人選的需要，未先單獨歷練政治局委員，屬於「越級晉升」。 ● 滿足一項加分條件者爲王樂泉、王兆國、回良玉、劉雲山 4 人，未滿足任何條件者爲王剛。均未晉升政治局常委。
李克強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前可能的變數是中共在二〇一二年之前增補政治局委員。不過，自一九九四年增補黃菊（先出任上海市委書記）爲政治局委員之後，迄今已經多年未出現這類例子。儘管二〇〇九年傳出十七屆四中全會可能會增補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曼娜，2009），事後證明並無人事增補議案。因此除非十七屆五中全會增補政治局委員，否則擔任十八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應該都是現任政治局委員。[26]

接下來，本文據此評定剩下來的 11 位領導人，呈現其競爭優勢。從表 13 中可以發現，劉雲山和劉延東（女）兩人最不具備晉升政治局常委的競爭優勢。他們長期在單一的部門工作(一爲中央宣傳部，一爲中央統戰部)，既缺少年齡優勢，也缺少地方黨政一把手歷練和交流經驗。若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仍爲 9 人規模，李源潮、汪洋、王岐山、張高麗、張德江、俞正聲、薄熙來等 7 人都非常可能同時在二〇一二年晉升政治局常委。如果常委會人數縮減，則需再增加其他變項以便區隔他們之間的競爭優劣所在。

表 13　十八屆政治局常委可能人選的競爭優勢評比

		姓　　名	年齡優勢	地方歷練	交流經驗
連　　任		習近平	略		
		李克強	略		
新任	滿足三項加分條件	李源潮	○	○	○
		汪　　洋	○	○	○
	滿足兩項加分條件	王岐山	X	○	○
		張高麗	X	○	○
		張德江	X	○	○
		俞正聲	X	○	○
		薄熙來	X	○	○
	未滿足任何加分條件	劉雲山	X	X	X
		劉延東	X	X	X

資料來源：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行整理計算，原始資料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26] 2010 年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是一個觀察中共高層人事甄補的指標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捌、結　論

近年來許多文獻轉強調年齡限制、任期限制、階梯式晉升規律、省級地方歷練等制度因素在領導人流動過程中的影響力。這些文獻不否認非制度因素的角色，但認爲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制度因素對中共政治繼承的重要性越來越大，非制度因素只能在制度因素的框架下發揮作用。這個發展導致中共高層人事更替出現某種程度的預測性。根據這個觀點，本文歸納十三大以來 57 位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含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甄補特徵後，得出預估政治局委員的三個基本條件和七個加分條件，和預估政治局常委的兩個基本條件和三個加分條件。這些條件內容涵蓋年齡要求、政治局委員資歷、中委會資歷、省級黨政一把手資歷、交流經驗等等不同面向。

本文進而指出，習近平、李克強兩人應該會在十八大可能連任政治局常委，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人選爲李源潮、王岐山、俞正聲、張高麗、薄熙來、汪洋、張德江等 9 人。劉延東、劉雲山兩人晉升常委的機會相對較低，除非有本文未涵蓋在內的因素對晉升常委有關鍵性的影響。十八大有機會連任的十七屆政治局委員爲前述 11 人。新任政治局委員的可能人選包括王滬寧、令計劃、趙樂際、王珉、孫春蘭、吉炳軒、盧展工、劉奇葆、張春賢、韓長賦、宋秀岩、張寶順、袁純青、郭庚茂、張慶黎、王君、姜異康、強衛、楊晶、韓正、王正偉、張慶偉、郭聲琨、徐守盛等 24 人。若以目前政治局 25 人的規模來看，他們之中約有 14 人左右將進入十八屆政治局。楊傳堂、胡春華、孫政才、周強 4 人的條件也很好，但其於本文未納入分析的不同原因，如健康情況、梯隊接班部署等，在二〇一二年當選政治局委員的機會相對較低。

爲了檢驗本文找出的甄補特徵是否合理，本文特別先以十七大中共高層人事異動爲例進行測試，結果發現，雖然「預估名單」的人數是實際當選人數的四倍，但只有劉延東不是「預估名單」的熱門人選，實際上當選政治局委員。習近平、李克強在「預估名單」中是新任政治局委員的熱門人選，但實際上越級晉升政治局常委。除此之外，其餘十七大連任或新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均在「預估名單」當中，預估的職位也吻合。這個結果也加強了本文對十八大人事更替預估的信心。

這種制度化帶來的高層人事更替的「有限的預測性」代表什麼意義呢？如同近年來強調中共走向制度化的文獻隱射的，本文認爲這代表中共統治菁英雖然無法預先確定權力競逐的結果，但對政權體制存續和權力分配的遊戲規則已經享有高度共識。部分研究民主鞏固的學者曾指出，「菁英共識」（elite consensus）的存在與否是民主轉型階段和民主鞏固階段最大的不同（Field and Higley, 1985: 4；Higley and Burton, 1989: 20；Burton et al, 1992: 3-13；Field et al, 1990: 149-182；Higley and Lrngye, 2000: 5）。依照這個邏輯觀察中共政治走向，外界恐怕較難冀望中共仿效蘇聯、東歐多國的轉型經驗，因統治菁英內部分裂而導致民主化。[27] 同樣的，當外界在探討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時候，也應該把一手壓制異議人士，防止社會出現反對派菁英，另一方面統治菁英又能形成共識的弔詭現象，一併納入討論的範圍內。不過，但這種共識只意味統治菁英內部對於權力分配的遊戲規則形成共識，不代表這個共識未來不會破壞，也不代表國家就能免於社會挑戰。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2006，《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教程》，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

王曼娜，2009，〈傳中共 17 屆 4 中全會爲 18 大政局做準備〉，中央社（網路版），http://www.cnanews.gov.tw/mnd/mndread.php?id=

[27] 關於統治菁英分裂是政權轉型重要關鍵的論點，見吳玉山（1995）；Przeworski (1991)。事實上，自 1992 年以後，中共內部雖有政策歧見與權力鬥爭，但已無路線衝突。以目前情勢來看，若非社會爆發嚴重事故，導致統治菁英對回應社會挑戰的策略出現嚴重分歧，否則中共走相菁英分裂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幾個可能的引爆點如貧富差距加大、幹部腐敗嚴重、族裔衝突惡化等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908260169，2010/1/22。

作者不詳，無刊登時間，〈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是個什麼職位啊？〉，SOSO問問網頁，http://wenwen.soso.com/z/q55948713.htm?rq= 190270697&ri=4&uid=0&ch=w.xg.llyjj，2010/2/10。

吳玉山，1995，《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之比較》，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吳國光，1997，《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李 民，2007，〈交流制度：培養幹部的一種好形式〉，《學習時報》，轉載於人民網，http://www.china.com.cn/xxsb/txt/2007-05/15/content_8254898.htm，2010/3/6。

李 林，2007，〈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中共黨史研究》，轉載於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6746，2007/3。

李 銳，2001，〈耀邦去世前的談話〉，《當代中國研究（美國）》，4: 23-45。

李玉梅，2009，〈李源潮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答記者問〉，新華網（北京），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2/01/content_12569901.htm，2010/02/19。

李美華等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冊》（第八版），台北：時英。譯自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李海文，2009，〈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來及職權〉，《領導文萃》，引述自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1/29/content_10732688.htm，2010/2/22。

阮 銘，1993，《中共人物論》，紐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胡 偉，1998，《政府過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席 宣、金春明，1996，《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

寇健文，2002，〈權力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公司，頁 53-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寇健文，2005，《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寇健文，2006，〈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45(3): 35-79。

寇健文，2007，〈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8(4): 49-95。

寇健文、黃霈芝、潘敏，2006，〈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東亞研究》，37(2): 1-38。

陳瑞生、龐元正、朱滿良主編，1992，《中國改革全書（1978-1991）：政治體制改革卷》，大連：大連出版社。

陳麗鳳，2008，《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1921-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華網，2006，〈授權發布：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新華網（北京），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06/content_4926453.htm，2010/03/18。

趙建民、劉松福，2007，〈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及決策體制之變遷〉，《遠景基金會季刊》，8(1): 53-86。

劉松福，2008，〈集體領導如何演變爲個人獨斷－中共延安整風前後黨內高層決策體制之變遷〉，《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 142-159。

劉思揚、孫承斌、劉剛，2007，〈爲了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新華網，http://news. 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1498.htm，2009/ 12/23。

薛慶超，2006，《革故與鼎新：紅牆決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Barnett, A. Doak. 1985.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Bo, Zhiyue. 2003. “The Provinces: Training Ground for National Leader or a Power in Their Own Right?” In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21s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eds. David M. Fineistein and Maryanne Kivlehan.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66-117.

Bo, Zhiyue. 2006. "Princeling Generals in China: Breaking the Two Career Barriers?" *Issues & Studies* 42(1): 195-232.

Burton, Michael, Richard Gunther and John Higley. 1992. "Introduction: Elite Transformations and Democratic Regimes." In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eds.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7.

Field, Lowell and John Higley. 1985. "National Elites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Research in Political and Society: Studie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Elite Groups, vol.1*, ed. Gwen Moore.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1-44.

Field, Lowell, John Higley and Michael G. Burton. 1990. "A New Elite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Sociology." *Revue Europe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28(88): 149-182.

Higley, John and Michael G. Burton. 1989. "The Elite Variabl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Breakdow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1): 17-32.

Higley, John and Gyorgy Lrngyel. 2000. "Introduction: Elite Configuration after State Socialism." In *Elites after State Socialism: Theories and Analysis*, eds. John Higley and Gyorgy Lrngyel.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1-21.

Li, Cheng. 1994.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2: 1-30.

Li, Cheng. 2002. "After Hu, Who? – 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Await Promoti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1: 1-3.

Li, Wei and Lucian W. Pye. 1992.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132: 913-936.

Przeworski, Adam.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ih, Victor. 2004. “Factions Matter: Personal Network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ank Loa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38): 3-19.

Tanner, Murray Scot and Michael J. Feder. 1993. “Family Politics, Elite Recruitment, and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89-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aths to the Top:

The Political Mobility of Chinese Civilian Leaders After 1987

*Chien-wen Ko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cess of elite transition in the top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stitutionaliz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adership changes that occurred in each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ginning with the 13th Congress in 1987. We first examine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age limits, central posts previously held, and experience as a provincial leader, that can explain the political moves of all fifty-seven individuals who have served as full or alternating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ince 1987. This paper then uses these factors as indicators to identify about thirty frontrunners for the 18th Politburo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due for election in 2012.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al Mobility, Political Elites, Politburo Members,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cwkou@n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